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黄绍竑（1）

“四·一二”事变关于广西方面资料的补述
……黄绍竑（43）

缅怀英烈，忆“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在南宁的大屠杀……杨赐章（50）

“四·一二”事变前后东兰两次遭受摧残见闻
……覃联魁（63）

一九三一年春廖磊率部进犯东兰、凤山的经过
……杨赞模（68）

一九三二年秋廖磊第二次率部进犯东兰、凤山和谋害韦拔群同志的经过……沈　治（76）

“四·一二”事变前后南宁军校清党反共惨案点滴……黄闲道（82）

“四·一二”事变我在南宁狱中的见闻……吕集义（88）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梧州革命运动的回忆……周　济（94）

“四·一二”事变桂林、平乐捕杀忆述……何若真（99）

“四·一二”事变柳州清党捕杀点滴……刘克初（103）

李宗仁起家经过……尹承纲（104）

谈谈桂系秘密政治组织……程思远（1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昆仑关战役亲历记……陆学藩（151）

山东莱芜战役桂系四十六军被歼经过……周　竞（171）

襄阳战役白崇禧黔驴技穷，康泽裴死被俘…辛戈鸣（184）

孙中山先生对老桂系军阀陆荣廷的争取和讨伐
……潘乃穆（200）

陆荣廷重返广西的几件事……陈良佐（227）

附　载

征稿启事……（246）

“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

黄绍竑

写在前面的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间我去见民革主席李济深同志，首先是汇报我到东北参观的经过和感想，其次谈到我被任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委员，要着手写一些历史资料。他过去是同我在政治活动上最有关系的人之一，我要写的历史资料好多地方与他是有关系的，我所以向他报告，是想听听他对我写历史资料的意见；同时对于与他有关系的问题，某些我不大清楚的地方，以后还可以请问他。李济深主席说：“很好！您应该把我们经过的你所知道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您！”

关于“四·一二”事变，他和我都参加过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反共会议和第一次反共战争，这是国共分裂和反共战争的开始，大革命的伟大事业从此遭受失败，我们也从此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黑暗道路，做了很多残害人民的罪恶勾当，回首前尘，真是万分惶恐与惭愧。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

党和毛主席宽大为怀，不但不究既往，并且予以优厚的待遇，我衷心感谢。

李济深主席不幸逝世了，现在国内参加上海反共会议和第一次反共战争的仅剩了我一人，我可能写得不全面，希望读者指正。

第一部分　“四·一二”前我所碰到的有关问题

我是一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军人。一九一六年出了保定军校大门以后，几年之间，就做到了广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掌握了军政大权。我虽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我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其他革命著作，并没有深入研究，甚至没有好好地读过，我更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本上就没有什么认识，更谈不上拥护这个反对那个。那么我为什么要反共呢？到底那时候我在广西碰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先从党务说起　我是一九二三年才加入国民党的。在此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党。可以说一九二三年我加入国民党不是出于信仰三民主义，而是迫于时势。我和李济深、邓演达、陈铭枢、陈济棠等公谊和私交都很好，在他们劝勉下我参加了国民党。我加入国民党之后，连年都是打仗。

一九二三年梧州市就有了国民党市党部，是广西最早成立的党部，它是由广州国民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我虽驻在梧州，但它与我没有关系。主持梧州市党部的都是一些广州派来的青年男女，如周济、甘立申、龙启炎、李血泪、李家骥、黄昌佐、粟丰、李立群（女）、李联群（女）等，据说都是共产党员。我对他（她）们的言论行动觉得不顺眼。但同时我对于广西的老党员如马君武、刘玉山、刘震寰、刘崛、杨愿公等不是觉得他们老了，就是觉得他们会以老资格与我争地位争地盘。对于他们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那时我对搞党务的人，不论青年老年都无好感。

一九二五年广西省党部成立，国民党中央派李宗仁和我为广西省党务特派员指导广西全省的党务，这是根据那时的形势和我们的要求，并派覃超（国会派）、梁六度（省议会派）、周锡桓（省议会派，前清举人）、刘百揆（士绅派）、覃时宜（律师）、陈立亚（中央派）、陈勉恕（中央派中共党员）、黄家直（中央派）、石楚琛（我的秘书）为省党部筹备委员。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黄绍竑、陈立亚、陈协伍（前清举人）、黄家直、梁六度、陈勉恕、刘百揆、周锡桓（又名仲武）为广西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共九人，有一个记不起）；李宗仁、黄植溪（中学校长）、张任民（军人）、麦焕章（留法学生）、陈锡珧（士绅）、雷沛涛（中央派中共党员）为广西省党部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委员。黄绍竑为组织部长并兼宣传部长，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勉恕为青年部部长、陈协伍为农民部部长，黄家直为工人部部长，陈立亚为商民部部长，刘百揆为妇女部部长。这样似乎广西的党务都是我一手包办了（李宗仁已北伐）。其实不然，省议会派的梁六度、周锡桓（仲武）与中央派的陈立亚、黄家直、陈勉恕、雷沛涛成为一方面（左派）与其他方面（右派）作斗争，而陈协五亦加入左派，我起初表面上虽站在中间，其实是站在右面，左派对右派的攻击，也就是对我的攻击。因此，我对于省议会派和中央派往往不以为然。我记得一九二六年春天汪精卫和谭延闿到梧州访问的时候，我同他们谈广西党务，谭延闿对我说："广西好似一张白纸，你们要写什么文章，画什么花草都由你们自己作主，要是弄得复杂，将来问题就多了。"他的意思当然是有感于广州方面党务的复杂情形而发的。其实那时候谭延闿已暗示我反共了。广西党务到底是发生什么纠纷呢？

首先是左右之争　何民魂（也是广州派来的，接近吴稚晖，后来做过南京市长）为宣传部写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什么我记不清楚，而在封面上的图案是由左向右的L形，在省党部会议上陈立亚就提出质问，说是右倾的宣传形式，要不得，要重印。我说："是不是内容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如果有，就要重写重印；如果没有，就不必了。"他说："不管内容怎么样，那图案的L是由左向右，就是右倾。广州方面出版的小册子都是由右向左的」。"我说："你要图案放在右边岂不是根本就右了吗？"我不管他们怎么说就发

了出去。弄得他们很不高兴。其实那时我实际上虽然是站在右的立场上，而在意识上怎样叫做左，怎样叫做右我还分不清楚。我心里想同在一个党内为什么要分左分右。记得汪精卫在梧州饮醉了酒出门的时候我带他向右边走，他说“季宽，你走错了，革命是不能向右走的。”一定要我向左边走。结果没有路，走不通，仍然转回右边走。这些虽然是小事，可见那时左右斗争尖锐化。

祭孔的风潮　袁世凯时代每年都规定有祭孔的典礼，以维持封建统治的旧礼教。广西自一九二一年后因军事扰攘，都没有举行。一九二六年全省统一了，好些旧人主张恢复，尤以财政厅长苏绍章为最力（他是前清的拔贡生，容县人，我的父执辈，）并要我主祭。我是年轻的军人，对祭孔有什么政治意义，那时是不知道的，也就屈从了他们的主张，当了主祭，实行祭孔。祭后，省党部办的南宁民国日报的社论，就对于孔子和祭孔大事批评。说孔子的学说是封建的，祭孔是复古的反动行为，不是革命时期应有的现象。苏厅长见了大为生气，认为是大逆不道。他说：“办报的都是读书人，我不料读书人竟把自己的祖师反对起来了。这简直是忘本！人心变得这样，还成什么世界！”他要我惩办南宁民国日报主笔陈勉恕。祭孔我是头一次参加，要着长袍，穿马褂，必恭必敬地行完三献礼，足足费了两个钟头，实在觉得麻烦。如果年年都这样祭，我也不愿参加了。因此，我对他的要求并不赞成。只是答应告诉报馆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

批评。他大不谓然，并且用老前辈的口气对我说："你父亲也是读书人，得过前清的功名，你虽然是个武佬，也读过孔夫子的书，你纵然不礼重先师，难道就不体验你先人礼重先师了吗？"我听了他的话又好气又好笑。他见我不接受他的要求就愤而辞职了。这事在当时广西的旧社会里的确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风潮，陈勉恕也因此而被迫辞去了南宁民国日报的主笔。

工人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卅"惨案纪念日，梧州群众对驻梧英领事署举行示威大运动，所有在英领事署工作的中国人都退了出来。英领事惊慌地避上英国兵舰，逃到香港一直不敢回来。英帝国主义者那时长川派有两艘小兵舰驻在梧州，英国驻梧海军司令费志杰（译音）要派兵舰搭拉土拉（译音）到南宁游弋，托词保护侨民，要雇用带水（即内河领江人），我们的工会禁止工人受雇，因而不能开行。费志杰乃用武力将梧州港口封锁，断绝交通两日。后来经双方协议，以后带水由工会派定，外国兵舰不能自由私雇，工资亦由工会规定，事情才算解决了。英国兵舰以后再不敢到梧州上游去。因为他憷于当时澎湃的革命形势，而且怕工会派出的带水靠不住，故意把兵舰带向暗礁上撞坏。英领事署罢工一直没有解决，后来英国方面屈服了。由它的驻广州总领事同我交涉，愿意将梧州领事署撤销，把领事署地皮建筑交还中国，由广西省政府补回建筑费和地价二万五千元（梧州英领署占地三个小山头，是三十多年前梧州一个地痞以铜钱二十

四千文卖给英国人的）。这两件交涉的胜利都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光荣胜利，是群众运动伟大力量使英帝国主义者屈服。但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反以为这是由于我交涉的胜利，同时恐怕如果做得太过火，梧州被英舰武力封锁得太久，不但影响北伐军的运输（那时正是北伐出发运输紧张的时候），也影响广西的税收（广西的税收以梧州为最主要），于我的统治不利。

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间在南宁，因北伐军急于出发，需要的挑夫很多，一时雇请不及，就发生军队强拉工人当夫的事情，一个省党部做工人运动的同志叫陆几沉（共产党员）走来对我说："因为军队强拉工人当夫，工人非常愤慨，工人就要罢工暴动。"要我立即制止。我说："你们有没有尽到劝导工人踊跃担任北伐军的运输呢？"他说："我管的是工人运动，保护工人利益，我不管雇夫的事情。"我说："我现在就请你负责办理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尽到这个责任，我就没有法子禁止拉夫，因为他们是为了北伐，是为了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因而强制少数人担任运输工作，是应该的呀。"他说："工人要罢工暴动怎么办呢？"我说："罢工暴动是你说的话吧，或是你教他们罢工暴动吧！你不要以党部的人员来打击党的革命事业，更不要拿这些话来吓唬我，我不是这些话可以吓唬得倒的！"这位陆同志本来对我是好意，他本着那时国民党中央的扶助农工政策，来要我纠正军队的恶劣习惯，而我却把他的好意当成恶意，把北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大帽子掩盖军队拉伕的恶劣行为，把拉伕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并诬蔑了他。这就把反动军阀狰狞丑恶面貌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从此就对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反感。

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使我更伤脑筋。那时扶助农工的政策高唱入云，农民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搞得不好，乱子闹得更大。因此我推荐省党部执行委员陈协五先生当农民部部长，他是我的同乡，前清举人、破落地主，我想他老成持重，不会发生什么乱子，殊不料他当了农民部部长之后，样子大变，他天天头戴礼帽，赤脚草鞋，装成农民的样子，与农民在一起，我真看不顺眼。为二五减租，他召集南宁附近的农民几千人开会游行，向省党部、省政府请愿，要求由农民自己来实行二五减租。我对他说："二五减租是中央党部既定的政策，省政府一定照办。但是要等待减租条例制定之后，才好办理，不能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你不要这样搞呀！"他说："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如果政府不照办，农民就要反对政府。"我说："农民有什么力量呢？"他说："你有洋号，我们有螺角（农民作战用的号角），你有洋枪，我们有锄头。组织起来的农民，是不怕你那些军队的。"那时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想：你是一个烂举人破落地主，怎样变得这样快，一旦当了农民部长，就要搞起我的乱来了。他是我的同乡前辈，我不好说什么，只是笑笑；而心里却种下了对于农民运动的不满。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农民起义　农民运动在全省各县

都起来了，一些地方是由国民党人领导的，绝大多数是站在地主富农方面；一些地方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完全站在贫雇农方面；我无疑是站在地主富农方面。对二五减租要根据政府的法令办理。而政府对于所谓二五减租法令则迟迟没有公布。后来虽然公布了，也是偏袒地主富农的。韦拔群是东兰县壮族人，是桂林法政学堂的学生，曾在贵州讲武堂毕业，后来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加入了共产党。他并没有经过广西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委派，就暗地回到东兰县组织农民协会，并且组织农民武装，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将东兰县城攻破，放监犯，杀地主，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那时，广西刚统一不久，这种突起的异军，我很惊讶。我只好派兵镇压，由驻百色的旅长刘日福派团长龚寿仪与县长黄守先把县城"收复"。韦拔群的农民军退入武篆山内，宣传组织日益扩大，等到军队撤退，重陷东兰县城，就以东兰县农民协会的名义电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广西省政府、广西省党部，说是土豪劣绅勾结县长压迫农民，枪杀农民，要求查办。在当时扶助农工政策之下，不但广州方面对这事件很为重视，就是广西省党部里面也有不少的人对他们（指韦拔群等）表示同情的。我在这种形势之下，乃建议由广西省党部、广西省政府、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部组织调查委员会前往调查，共同处理；并定出解决东兰农民土绅斗争的办法八条。这八条原文现在虽然记不清楚，但毫无疑问那个调查委员会站在我方面的人员要占多数，定出的办

法也肯定是不利于农民的。这事虽一时停止了武装的冲突，而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则日益发展。他们把劣绅地主杀了，土地分了，把妇女解放了，成为当时广西境内另一个新社会，使广西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更为不安，成为我参加“四·一二”事变主要的原因，而致有以后的更大规模对农民的镇压屠杀。总之，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运动的力量，起初是轻视的，后来是惧怕的。起初是想利用来为反动政治服务，后来见利用不了，就实行镇压。这是我从统治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同鲍罗廷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秋天，我因患重病去广州治疗住在珠江颐养园。当时国民政府的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来看我。那时我还不能起坐，他在我的病房里畅谈广西的情形，他尤其注意广西的社会经济状况。我说广西是贫穷省份，没有什么大资本家，都是一些小商人，地主既不多，也不大。据我所知，家乡容县最大的地主，每年所收租谷超过三千担的（每担一百斤），只有两三家。我强调绝大多数是自耕农，因此二五减租在广西是容易行的，但于农民的利益是不大的，不普遍的，主要的是农业技术的改进。他听了我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说：“一年收租三千担的还不算大地主吗？”又说：“请你数数广西境内总共有多少家当铺（即押当），我虽没有到过广西，但我知道在梧州上游的沿江县城圩市都有当铺的。大楼耸立河边，内地当然更多。这些难道不是剥削贫民的资本家么？这些都是由大地主发展的产物。”

情形的确是如此。另外一个派到广西的苏联政治顾问也对我说过。但我那时心里并不以为开当铺的就是大资本家，我的祖父和我的兄弟都是以地主的身份开当铺的，我做了广西反动统治者之后，各地很多当铺因为军事的原故都关了门。我认为贫民的借贷机构没有了，我要财政厅拨款由政府开当铺，叫做“公押”月息二分，比私押低了一分。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贫民的。因此鲍罗庭说开当铺的是地主资本家剥削人民，我心里很不同意。他又说：“广西的地主可能没有广东的大，但广西的耕地比广东少，就如你那样说，在土地占有的比例上比广东的地主还大。广西的资本家当然没有广东的大和多，但他们剥削是一样的，可能更大。”我当然不以他的说话为然。就是二五减租虽说是奉令执行，对自己和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是执行得不彻底的。在这次的谈话里，很明显地表露我的反动阶级立场；同时我对鲍罗庭认为他是国民政府的苏联政治顾问，他对我谈这些问题，我不可解，我起了怀疑，怀疑他要在中国搞共产。

我与范萼的谈话　范萼是甘乃光介绍来的，在第七军政治部当秘书。有些人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有些人说他是投机分子，我弄不清楚。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他同我乘船下梧州，那时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蒋总司令介石”的声名全国皆知，但随着已有人说他的坏话。武汉同南昌已闹得很厉害。范萼对我说：“你想不想比蒋总司令享有更大的名誉，得到更多人的拥护？”我听了他的这两句话，愕然不知所

谓。他说："你现在真正具有统治一省的权力，广西的党务政治军事一切都由你做主，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没有人敢来阻碍你的，只要你下一个命令实行孙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不但广西全省的农民拥护你，就是全国的农民也拥护你，你真是无比的伟大，蒋介石就不算什么了。而且广西是一个穷省，现在广西的财政来源是靠烟税（一年约一千多万）、赌饷（一年约三百多万）为大宗（约占全省收入的半数以上），这在革命政府的财政上是不正常的，将来一定要禁烟禁赌，如果禁了，这大宗的收入就没有了，你拿什么来抵补呢？不但广西的建设前途没有希望，就是你的军政费也无法维持。如果你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对地主每年要缴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耕者有其田后，政府只向农民征收百分之三十的税，农民一定很愿意的。广西全省土地生产粮食照人口推算，约为五六千万担，征收百分之三十，政府每年至少可收到一千五百万担粮食，每担以三元计算，就有四千五百万元，比现在的收入要增加两倍，岂不是一切的财政问题都解决了么？"他这番话虽然听了是很动人的，我既不赞同，也不立刻回绝，而是找一些问题来反问他。我说："广西全省有多少地主、有多少自耕农、有多少佃农，你知道吗？他说："不很详细，但估计总是佃农最多，自耕农也不少，地主最少。"我说："地主反抗自不必说了，就是自耕农也不会服从的，因为过去的田赋至多不过十一之征（那时全省田赋仅二百四十多万），

现在突然要征到十分之三，他们愿意么？这些自耕农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与地主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啊！”他说：“各地农民协会多已组织起来了，佃农为自己的利益必然拼命斗争。他们是大多数，最后一定得到胜利。此外还有你的军队作后盾，那些士兵都是贫雇农子弟，也一定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这种政策的实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说：“据我所知，广西的自耕农很多，他们与地主多有武装，他们联合起来反抗，政府那些军队是镇压不住的，军队的士兵贫雇农子弟固多，而自耕农的子弟也不在于少数，他们平时对阶级斗争是不认识的，只知道服从长官的命令。至于那些军官呢，十分之七八都是家里有几亩田的小地主子弟或大地主子弟，其余虽目前不是地主，但是他做了军官就想家里买几亩田，作下半世的生活基础，那时就未必会盲目听从我的命令去毁灭他们已有的生活基础和希望了。甚至有人煽动他们来反叛我，到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本来是一个五百担租谷的大地主出身，即使我超阶级不顾成败地做去，他们就肯跟着我走么？恐怕于事无济，反而弄到遍地流血，比一九二一年至二六年还要混乱得多呢。你要知道，我们经过五年的苦斗才得到今日的统一局面。如果因此而再闹得四分五裂的流血惨祸，这个责任我能负得起吗！”我这番话驳得他无话可说了。也就是根据自己地主阶级立场观点提出来的，我觉得很有理由把他驳倒了。其实我的反共言论已充分暴露出来了。他见我这样也就

离开了广西。

就以上所述的种种，如党务问题、左右的争论问题、祭孔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与鲍罗廷、范萼所谈论的问题，无一处不暴露我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无一处不与我有矛盾。我觉得广西的江山是我们自己打得来的，有了党部、有国共合作才发生这许多的麻烦事情，蒋介石的反共正中了我的心怀，我就跟他反共。如果蒋介石不反共而是另一个人反共，我也会起来跟着走，甚至自己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

第二部分　去上海参加反共会议和以后

一九二七年春间的形势　到了一九二七年的二三月间，武汉、南昌以及各地国共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北伐前国民革命军仅有八个军的番号，分两路出兵北伐：一路由湖南进军，是第四军张发奎、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第八军原驻湖南）；一路由江西进军，是第一军何应钦、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六军程潜（第五军李福林留守广东）蒋介石亲自在那方面指挥。四、七、八军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天很快就把汉口、汉阳占领了，围攻武昌，但江西方面久攻南昌不下。因此孙传芳的主力得在南昌九江铁路线上活动，对武汉威胁进攻，已到武汉的第四军第七军不得不调到南浔线上将孙传芳的主力击败。蒋介石也占领了南

昌。那时蒋介石如果真心北伐，把总司令部及军队主力进驻武汉，沿京汉铁路直捣北京，是很容易的事。但蒋介石别有用心，逗留南昌不肯到武汉去，把军事重点放在江南，以造成宁、汉分裂的局面。那时北伐的军事布置大概是这样的：何应钦是东路总指挥，率领第一军的一部、第三军、第六军、第七军，还有贺耀祖的部队由江西出皖南向南京；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原是第七军的参谋长，北伐后蒋介石调他当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率领第一军的两个师（师长刘峙、薛岳），第二军（谭延闿部由鲁涤平指挥）由江西上饶入浙江向上海前进。孙传芳、卢香亭的主力已在南昌和南浔线上被歼灭，因此东路军很顺利地占领上海和南京，也就是蒋介石要勾结帝国主义者与武汉分裂对抗的局面已经造成了。①

蒋介石由南昌发来的电报　大约是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下旬，李济深有急电给我，要我立刻秘密到广州去商量。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情，我想十之八九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与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那时我的家眷还住在珠江颐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并不引起人们很多的注意。我乘专轮到广州，立刻与李济深见面，他出示蒋介石由南昌拍来的电报，要我们克日到上海去与他见面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不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但我们早就猜到了一定是为了反共。李济深问我的意见，我把广西内部最近的种种情况报告了他。他也将广东最近的情况告诉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